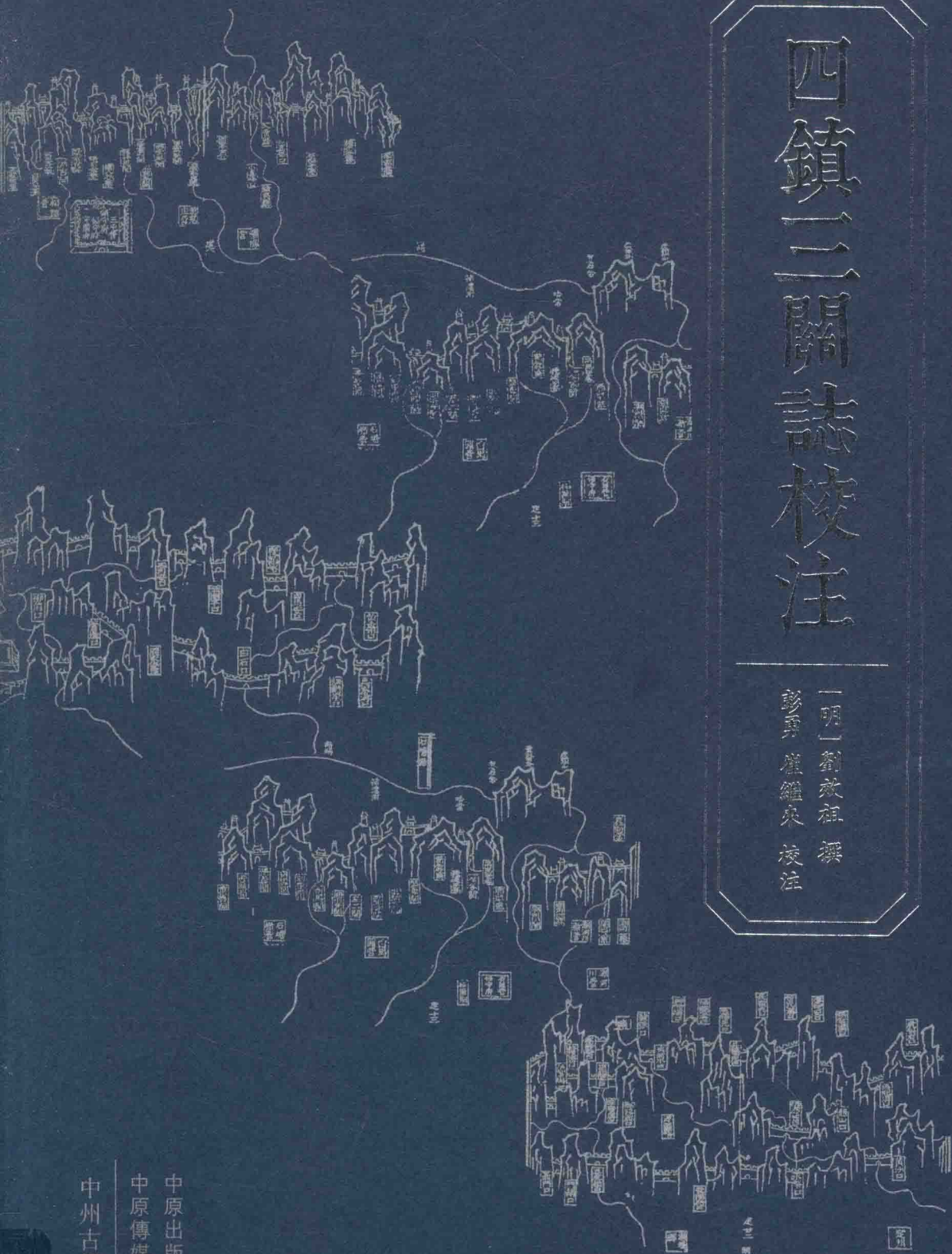


四鎮三關誌校注

「明」劉效祖撰
彭勇 崔繼來 校注



中原出版傳媒集團
中原傳媒股份公司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四鎮三關誌校注

一明一劉效祖撰
彭勇崔繼來校



中州古籍出版社

· 鄭州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鎮三關誌校注/[明]劉效祖撰;彭勇,崔繼來校
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348-7213-6

I. ①四… II. ①劉… ②彭… ③崔… III. ①華北地
區—地方志—注釋—明代 IV. ①K29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170120號

四鎮三關誌校注

出版人 張存威
策劃編輯 馬達
責任編輯 賈保倩
責任校對 岳秀霞
裝幀設計 曾晶晶

出版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鄭州市經五路66號
郵編:450002
電話:0371-65788693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開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張 54.25印張
字數 1104千字
定價 296.00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由出版社負責調換。

校注人員名單

彭	勇	崔繼來	李宜潔	李夢琴
肖	晴	馬明亮	段晉媛	李永超
任	陽	彭朝陽	李鳳霞	

《四鎮三關誌》及其價值

《四鎮三關誌》，十卷，明人劉效祖撰，劉應節、楊兆、王之弼等修。本書完成於萬曆二年（1574），於萬曆四年刊刻、萬曆六年增修。“四鎮”指薊州鎮、昌平鎮、真保鎮和遼東鎮，“三關”指居庸關、紫荆關和山海關，這裏在嘉靖“庚戌之變”之後，明朝北邊防禦最緊要的地區，集中了明朝數量最大、最精銳的武裝力量。本書屬地方志類中的專志，是明朝人編修並流傳至今的最為重要的邊關志書之一，被研究明代制度、軍事、政治和民族等史事者廣為徵引，可惜目前尚無專文對此進行專門研究。故擬對本書作者、編纂過程、內容及其價值予以簡要介紹，以利於瞭解這部珍稀文獻。

一、志書的編纂

《四鎮三關誌》署明人劉效祖撰。它的編修共同發起者，是時任總督薊、遼、保定的劉應節和巡撫順天的楊兆，由密雲兵備道王之弼負責落實修撰具體事宜，故此書流傳本又署有劉應節、楊兆、王之弼等人修、撰、纂。由於此志屬邊關專志，事涉軍政、錢糧、兵馬、職官以及詔令、奏議等內容，又非當時普通文人所能全面掌握；所以，先由劉應節和楊兆憑藉其職掌收集、整理了相關資料，“摭譜牒、收遺事”，並聘請熟悉四鎮三關形勢，且曾擔任過兵備副使的劉效祖主持編撰。從萬曆二年（1574）到萬曆四年（1576），劉效祖在披覽舊志、當時所存檔案文書以及親赴實地調研的基礎之上，且以官方的服務團隊為保障，“畧溯殷周，迄於勝國，存其大者。詳自庚戌以來，諸談兵家，撮其要，刪著於篇”，最終完成了全書。^①

1. 撰者生平及其著作。

劉效祖，字仲修，別號念庵，祖籍山東濱州。永樂中，“徙其始祖自濱州，實都

^① 見本書《序一》，第2頁。

下”，占籍武驤左衛^①，徙居京師順天府。故文獻中劉效祖有京衛、順天或宛平（或大興）等不同的籍貫。

據王一鶚（1535~1591）所撰《陝西按察司副使劉公效祖墓志銘》，劉效祖生於嘉靖壬午年（元年，1522）七月，卒於萬曆己丑年（十七年，1589）二月，年六十有八。他於嘉靖庚戌年（二十九年，1550）科舉考試中三甲第九十二名，出任河南衛輝府推官，戊午年（三十七年，1558）陞戶部廣西分司員外郎，旋陞雲南司郎中。後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出任固原兵備道副使，這是他的最高任職。此後官場、文壇多徑稱其為“劉副使”或“劉憲使”。嘉靖四十二年（1563）大計時被免官，回到北京。他“辟日涉園，日日陶情觴詠間，少醺，作樂府數闕，擊節歌之……”^②有突出的文學造詣。^③除《四鎮三關誌》之外，據《千頃堂書目》及萬斯同《明史·藝文志》等書記載，其主要著作有數種。《千頃堂書目》卷二十三記劉效祖作品及其人如下：“劉效祖，《劉仲修先生詩稿》，又《文稿》，又《塞上言》一卷，又《盛世宣威》一卷，又《清時行樂》一卷，又《鐙市謠》一卷，又《長門詞》一卷，又《雲林和詩》一卷。字仲修，濱州人，居順天，官固原兵備副使。以賦詩自豪，篇什流傳中禁，皆知其名，穆宗嘗遣中官索其詩，都人盛傳其事。”^④劉效祖的詞曲小令在當時頗有名，曾流傳宮中，散曲有《空中語》一卷、《閑中一笑》一卷、《裁冰剪雪》一卷、《都邑繁華》一卷、《蓮步新聲》一卷、《雲林稿》六卷、《混俗陶情》、《良辰樂事》等八種。另有《短柱效顰》一卷、《春秋窗稿》二卷等。^⑤其中，不同典籍所載書名又有很多不同之處。由於這些

① 據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三十四《人物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70頁及朱保炯、謝沛霖《明清進士碑刻題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963頁記載，劉效祖係武驤左衛（即明山東濱州）人。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八《地理類下》等文獻稱其為武功左衛人，誤。參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5頁。

② 焦竑《國朝獻徵錄》卷九十四《陝西·陝西按察司副使劉公效祖墓志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05冊，齊魯書社1996年，第327~328頁。

③ 目前學界對劉效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其文學成就方面，如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下卷《近代文學》第六十三章《嘉隆後的散曲作家們》，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965頁；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下卷第二十八章《明代的散曲與民歌》，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244~245頁；趙義山《明清散曲史》第九章《曲壇絕藝：時尚小曲與馮夢龍等人的擬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297~299頁。

④ 《千頃堂書目》卷二十三《別集類》，第594頁。

⑤ 《千頃堂書目》卷六《地理類上》，第787~788頁；萬斯同《明史》卷一百三十七《藝文五·集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冊，第573頁；陳田《明詩紀事》己簽卷十，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學林類⑪》，明文書局1991年，第604頁；《國朝獻徵錄》卷九十四《陝西·陝西按察司副使劉公效祖墓志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05冊，第328頁。其中《混俗陶情》一書見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康熙二十九年劉芳永刻本；《良辰樂事》不分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3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86頁。

文學作品部頭有限，不易保存，可惜當時就多已散佚。後由其從孫劉芳躅等在諸家選本中搜集殘存編為《詞鬻》一卷，收錄他的小令一百一十二首，套數一套。^①

然《千頃堂書目》卷六《地理上》記：萬曆《密雲縣志》係劉效祖在萬曆年間修^②，但王一鶚所撰墓志銘中並未提及。其詳情當是民國《河北通志稿》做出的解釋：“萬曆《密雲縣志》二冊，明張世則修、祝文冕纂，見《康熙縣志》。張世則，山東諸城進士，萬曆三年知縣事。祝文冕，邑人，萬曆丙戌進士，官刑部主事。萬曆六年成書，有張世則自序。案：是志，當時督修志為督理密雲糧餉事務戶部清吏司郎中戴耀，整飭密雲提刑按察司副使、兵備道劉效祖。故《遼史拾遺》十四引《內閣書目》、《千頃堂書目》，均作劉效祖修。”^③

近年，隨著《四庫禁燬書叢刊》印行《四鎮三關志》，學術界對它的瞭解越來越多，但對劉效祖的生平及其論著的研究却極其有限。僅有吳豐培先生整理此書時有過數百字簡短的介紹，這成為我們瞭解此人此書的主要依據：“纂者劉效祖，見附《明史》卷三百其子文炳傳，為明崇禎帝生母孝純皇后之弟，文炳之父，後封新樂伯，改新樂侯。《國朝獻徵錄》記云……”在該文的最後，整理者云：“故友王庸先生撰有《中國地理圖籍叢考》，其中《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著錄此書，並記成書始末，今部分引用，並對故友沈致緬懷之忱！”^④可惜，這裏把兩個劉效祖視為同一人了。很不幸，這段介紹恰恰是錯誤的。^⑤實際上，新樂侯劉效祖生活的年代要比作為兵備副使的劉效祖稍晚一些，“新樂侯劉效祖，莊烈帝母孝純太后弟，莊烈帝即位封。崇禎八年卒，九年贈侯，予三代誥。十三年九月，父應元追封瀛國公”^⑥。作為崇禎朝外戚的劉氏，其祖籍在海州（今屬江蘇連雲港），他們也並不是同一地方的人。^⑦只不過，兩個劉效祖，

① 《詞鬻》一書現藏國家圖書館。通過圖書館“館藏目錄檢索”，有金陵盧前《飲虹簃所刻曲》本（普通古籍，有民國二十五年刻本和廣陵古籍刻印社1979年影印本）、康熙三十五年胡介祉谷園刻本（善本）、謝伯陽《全明散曲》點校本（引廣陵古籍刻印社1979年影印本《飲虹簃所刻曲》和康熙三十五年胡介祉谷園刻本《詞鬻》，齊魯書社1994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739冊所收《良辰樂事》即為《詞鬻》，不分卷，與謝伯陽《全明散曲》所收劉效祖小令篇、目相同，只是有幾處文字畧不同。

② 《千頃堂書目》卷六《地理類上》，第154頁。

③ 王樹枏等纂修民國《河北通志稿》之《舊志源流》卷一，國家圖書館藏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葉15a。

④ 馬大正、吳錫祺、葉于敏整理《吳豐培邊事題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12頁。

⑤ 王庸編《中國地理圖籍叢考》甲編《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二《邊鎮合志》，商務印書館1947年，第39~41頁。

⑥ 張廷玉《明史》卷一百八《表第九·外戚恩澤侯表》，中華書局1974年，第3302頁。

⑦ 唐仲冕修、汪梅鼎等纂嘉慶《海州直隸州志》卷七《選舉十五·封贈》，國家圖書館藏嘉慶十六年刻本，頁15下，下畧；卷九《旌獎九·烈婦》，頁29上；卷二十六《列女二》，頁13下至頁14上。張廷玉《明史》卷一百十四《后妃二》，第3540頁載，“孝純劉太后，莊烈帝生母也，海州人，後籍宛平”。

到北京之後，一個是世襲的武官，一個是世襲的外戚。

2. 《四鎮三關誌》的成書背景。

關於《四鎮三關誌》的修纂背景，《纂修邊誌檄文》交代得頗為清楚：

國家定鼎幽燕，切鄰虜穴，而薊、昌、遼、保四鎮，實惟心腹肘腋重地。自嘉靖庚戌而後，虜患益熾，議論彌繁。每遇軍國大計，如聚訟於庭，築舍於道，意見各殊，紛然莫定，以案牘不存，文獻無徵故爾。夫畿輔邊關，延袤萬里，錢穀甲兵不啻百萬。而事體紛然，卒莫有定，并去其籍而莫之考焉，非缺典與？今幸廟謨日宣，先後承事諸臣，經畧亦密，華夷漸至乂安，戰守頗收實效，一代章程，蓋浸浸備矣。茲欲纂集邊事，輯而成書，以便檢閱，似不可缺。^①

從中可知，促成是志的修纂，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薊、昌、遼、保等四鎮三關地理位置重要；二是“庚戌之變”時，當地的防禦形勢頗為嚴峻；三是所需史志的缺乏；四是具備修志的主觀條件。

修志的客觀要求是，四鎮三關地處明朝與敵對的蒙古部毗鄰之地，處於京城拱衛的核心地位。“庚戌之變”後，北邊防禦形勢發生巨大變化^②，對此，楊兆的序言同樣開宗明義：“國家定鼎幽燕，北控大漠，蓋枕夷夏之交，示彈壓之勢，居重馭輕，為遠猷矣！”“庚戌往無論，其後烽火日棘，以厪天子徵兵集餉，增陣繕垣，賢人深謀於廊廟，經畧使者數出，日夜談干旄之事，畫制胡之策，焦神極慮，人言言殊，麗如繁星，爛乎牘中。”^③

修志的主觀條件此時也已具備。從《纂修邊誌檄文》之欽差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王（之弼）《為纂修邊誌以垂永久事》中可知，王之弼等人為保障劉效祖主持撰修《四鎮三關誌》一事的順利進行，把相關具體事宜一一落實。比如在密雲縣、石匣營給劉效祖提供住所各一處，既配有各類服侍的差役人等，也有禮聘生員作為助手；既將其個人生活用品和物資配備齊全，也準備了編修志書所需相應經費等。王之弼等官員要求“總計用費實數，分派各鎮道攤處解補”，“各鎮分校者俱集，則供應必得專官”，可謂考慮周詳。今天，我們已無從知曉差役群體的構成，但參與的官員和士紳的名單出現在《修誌姓氏》上，他們分別負責提調、經理、編校、監刻和供給等，共計十九人。

這是一部典型的動用官府的力量做保障，聘請名家主持修纂的優秀史志；這也是它

① 本書《纂修邊誌檄文》，第1頁。

② 彭勇《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

③ 保利拍賣行拍賣品《四鎮三關誌》公開書影《序》，<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67266-336326731.shtml>，“博寶拍賣網”，2016年4月28日訪問；另見本書《序一》，第1頁。

的品質要高於一般單純由官府或私人主持修纂志書的重要原因。

3. 本書的志書性質。

《四鎮三關誌》的撰寫性質定位很清楚，本書《凡例》開宗明義稱它是一部志書，“茲志總題曰志，其條目猶謂之考。若曰一方之書，搜括未精，遺軼不免，即有所述，亦備他日詔下，采以為故實耳”。地方史志的編寫在我國有着悠久的歷史，到了明代，編纂數量大幅度增加。地方史志書以一定區域為中心，記述某一地區自然、歷史、建置、沿革、政治、制度、地理、軍事、經濟、風土、人物、文獻、古迹等內容，故清代方志學大家章學誠說“方志乃一方全史”^①，是說方志是一部地方史。地方志因其內容極豐富，編寫有較強的連續性與繼承性，是研究史事中時間、空間特徵的重要參考文獻。

《凡例》亦稱它又是一部邊關鎮志：“茲志專為邊政，固地理事也。”明代的地方志種類繁多，根據方志記載的範圍不同，又分為全國性、省、府、州、縣、鄉、鎮，以及特殊的區劃，如都司衛所、邊關要隘、山水湖泊、寺廟道觀、名勝古迹等專志。《四鎮三關誌》的編修內容限定在“四鎮”和“三關”所轄區域內，既書寫它們在歷史時期的建置沿革和相關史事，更注重當時邊關政務最緊要的事情。

“九邊”是明代北部以長城為依託的軍鎮的統稱，主要包括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三關）、延綏（榆林）、寧夏、固原、甘肅等軍鎮。為防禦蒙古部的南下襲擾，明朝在二百餘年裏，在廣大的九邊地區駐扎軍隊，形成了以衛所為基礎、以長城為依託，行政與軍事體系相結合的軍鎮防禦體系，軍鎮具有相對獨立的地理屬性，因此也出現一批“九邊”志書。舉其大要者有：魏煥《皇明九邊考》（又名《九邊圖考》）、許論《九邊圖論》、吳時來《江防考》、張雨《邊政考》、廖希顏《三關志》、王士翹《西關志》、盧承業《偏關志》、馮瑗《開原圖說》、嘉靖《兩鎮三關通志》、正德和嘉靖本《宣府鎮志》、萬曆和康熙本《延綏鎮志》、楊時寧《宣大山西三鎮圖說》等。在明代數十種邊鎮專志之中，劉效祖《四鎮三關誌》毫無疑問是較為完善、詳盡的一部。

二、主要內容及其價值

1. 主要內容。

基於上述編纂目的和志書的性質，《四鎮三關誌》既體現專志的編輯體例特點，又依據本書編撰的目的來安排內容。對全書內容構成及各部分的重要性，劉效祖在其序中

^①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二十八《外集一·丁巳歲暮書懷投贈賓谷轉運因以志別》，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317頁。

以自問自答的形式做了簡單交代：

爲綱者十，爲目者三十，目無論也。綱首建置、形勝者，何也？堪輿位定也，封壤區分也，內外華夷，莫有辯於此者，不得不先之也。次軍旅、糧餉、騎乘者，何也？訓武在兵也，足兵在食也，騎乘所需以馳載，亦不可緩也。次經畧、制疏者，何也？頻年諸部使征繕，是急日討求而申飭之也。至以播之綸綍，騰之疏告者，皆爲關鎮計也。次職官、才賢者，何也？朝廷設官分職，莫重於邊吏也，乃聘績勒名者，毋論文武，不可謂無人也。終之以夷部者，何也？凡爲關鎮，計以禦虜也，虜入則關鎮不寧，不入則關鎮寧。其桴革所從，不可不預知也。^①

所言“爲綱者十，爲目者三十”，即每一“綱”包括三十“目”（實際另附有五小目），全書綱、目主要包括：建置考分圖畫、分野、沿革三目；形勝考分疆域、山川、乘障三目；軍旅考分版籍、營伍、器械三目；糧餉考分民運、京帑、屯糧（附鹽法）三目；騎乘考分額設、兌給（附胡馬、互市）和賠補三目；經畧考分前紀、今制、雜防三目；制疏考分詔敕、題奏、集議三目；職官考分部署、文秩、武階三目；才賢考分勳勞、謀勇、節義三目；夷部考分屬夷（附入貢）、外夷（附入貢）、入犯三目。共計三十五小目。

對此書的內容特點和價值，吳豐培先生在主持整理和影印時，做過簡短的評述：

內容豐富，類次明晰，於軍事布置，練兵辦法，均詳述及，可目爲軍事之書。糧餉數量，實物折色，折合當時銀兩，均爲準確計算。馬市交易，亦載規定，均可供研究明代經濟之用。且於遼鎮制疏中，涉及建州初期史料，亦可取材。鎮堡瞭臺修建辦法及經過，是研究長城沿革有用材料。職官人物，可補明代傳記所未備。卷首附繪輿圖多幅，可明代該地的概貌。甚至派遣夜不收的服裝和行動，軍中上下級的稱謂，都有述及。可謂纖細必載。^②

這段簡短的文字，指出了此書在軍事、經濟、民族關係、地理等方面的價值。作爲專門的北部邊關志書，它的內容突出體現了三個特點：一是邊地的自然地理環境，是書論述了四鎮三關的建置和形勝。二是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的構成，包括軍旅、錢糧、兵馬、戰畧戰術和策畧，以及防禦體系之中的諸色人等（官員、才賢）。三是北方民族關係狀況，即邊關防禦的對象。明朝四鎮三關的特殊性恰在於“腹心亦是邊地”，民族關係顯得尤其重要，是明後期北方防禦的重中之重。全書正是依據當時的現實需要來安排內容的。

2. 史料價值。

全書在內容的安排上，既照顧到一般志書的特點，如分野、形勝、建置、沿革、職

① 本書《序二》，第3頁。

② 《吳豐培邊事題跋集》，第11頁。

官和人物等，又有專志的側重，如軍旅、錢糧、騎乘、經畧、制疏和夷部等。其中，卷七《制疏考》的篇幅最巨，以全書近五十四萬字的分量計算，制疏部分就有二十七萬多字，超過了 50%，它匯錄隆慶和萬曆年間相關的詔令敕書、題奏、集議等數百通，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之所以注重編輯《制疏考》，劉效祖認為是“上情下達，政令通達，乃內治外安”的需要：

故君謂臣則有詔、有諭、有誥、有敕，臣謂君則有題、有奏、有策、有議。凡此皆所以宣上德、達下情，而敷治宣猷之不可廢者也。其在內治靡不為然，而障徼飛轡又蒸蒸焉。今詳括而類收之，以見一德交承之盛。^①

詔令奏議類文獻在政治史、制度史、軍事史和文書文獻學等方面價值很高，《四鎮三關誌》儘可能匯集軍政類詔令、奏議，成為研究明代北邊最重要軍鎮薊、昌、保、遼最為專門而集中的文獻。四鎮三關的總督、巡撫、御史、給事中等官員都是權兼行政、軍事、司法和監察等，他們的奏議還涉及國家政務運行的諸層面，是研究明代制度運作和實效最直接的材料。

詔令是指皇帝或以皇帝的名義頒行給臣民的政務類文書的統稱，即“王言”。按清修《明史》的分類，詔令包括詔、誥、制、冊文、諭、書、符、令、檄等九種。^② 作為處理國家政務的手段，詔令不僅是皇帝個人的意志體現，也代表了國家的意志，其具有政務性的同時也具有法規或制度的特點。所以，詔令屬於行政性公文，是法律性政書，是第一手原始文獻資料。《四鎮三關誌》所收制疏主要為嘉靖、隆慶兩朝的，也有少量正德、萬曆年間的，敕書均為“坐名”敕書。《薊鎮制疏·詔敕》中給楊兆的敕書有任命敕書、嘉獎敕書等，如《敕總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兆》、《敕獎總督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兆》、《敕獎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兆》、《敕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兆》等。給戚繼光的敕書主要有《敕諭署都督同知戚繼光總理練兵》、《敕諭署都督同知戚繼光總理兼鎮守薊鎮》、《制諭署都督同知戚繼光》、《敕總理練兵事務兼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右都督戚繼光節制客兵》、《敕總理練兵總兵官左都督戚繼光整飭邊務》等。自洪武、永樂以降，由皇帝和中央直接指揮和控馭文臣武將，敕書在軍國大事決策與運行中發揮了重要作用。^③ 但敕書在明朝前、後時期的使用有很大的不同，敕書“坐名”與否就能反映明代軍制是否有變化。以明代衛所京

① 本書卷七《制疏考·四鎮制疏總論》。

② 張廷玉《明史》卷七十二《職官一》，第 1732 頁。

③ 如明初征雲南時，太祖多用敕諭給衆將下達指令；對天下都司衛所官，亦以敕書形式訓誡勸勉。參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十五至卷八十八《詔令雜考》，中華書局 1985 年，第 1615~1701 頁。

操班軍的領班官員的敕書為例，他們在前期受領敕書要麼是群敕，要麼是不具名的，較少使用坐名敕書。但《四鎮三關誌》中所輯錄的均為“坐名”敕書，如《敕山東領薊鎮春班都司僉書張允嘉》、《敕河南領薊鎮秋班都司僉書劉確論》、《敕統領薊鎮德州秋班遊擊尹湘》、《敕統領薊鎮通津春班遊擊徐槐》、《敕統領薊鎮天津春秋班遊擊劉龍、祝琦》、《敕統領薊鎮德州春班遊擊安廷燦》、《敕河南領薊鎮春班都司僉書王惟藩》、《敕河南領薊鎮春班都司遊體仁》、《敕山東領薊鎮春班都司僉書王秩》等。自永樂末年，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和北直隸地區的都司衛所就有班軍到北京或京畿地區，分春、秋二班輪番防守，武官所領的敕書並不具名。只是到嘉靖之後，他們所受的敕書才由不坐名敕書變成坐名敕書，即每份敕書都是直接頒發給領班官員的，而不再是給一個機構或一種職位，這一變化揭示的是明代軍政管理制度的設置與演化，在演化的背後則是更為複雜的政治、軍事和民族等問題。^①

在本書中，奏議的數量最大。它收錄有一朝、一代、一類、一人或群體等不同範圍或性質的奏議文書。以奏議為主要素材進行的“經世文類”文獻的編輯整理的大量出現，既是明代完善、齊備的行政公文的集中反映，也為明代知識群體經世濟民政治理想的實現創造了條件，致使大量涉及國計民生的政務公文流傳。這些由臣下向上奏請的行政性文書，都帶有明顯的公務色彩，“治亂得失，於是可稽。此政事之樞機，非僅文章類也”^②。

明代志書也大多附有地圖，以山川形勝、城市布局、邊關防禦等內容為常見。圖考、圖論、圖說之類的軍事地圖與邊鎮海防等專志，共同構成了明代後期軍事地理類史志的主要內容。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國書館工作的王庸先生有感於祖國的內憂外患，完成了著名的《中國地理圖籍叢考》一書。該書包括《明代總輿圖匯考》、《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和《明代海防圖籍錄》等內容，並附有他的《明代倭寇史籍志目》（計七十二種）。其中，《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著錄“九邊總圖說”三十種，“邊鎮合志”三十二種，“各邊鎮別志”六十四種，“各路關衛區分記”九十一種；“邊鎮合志”的第一部，即是介紹劉效祖的《四鎮三關誌》。^③《四鎮三關誌》收錄有圖若干，總圖所載資訊涉及八府、十六州和一百十五縣，以及遼東都司、北直隸衛所、大寧都司、山西行都司、山西都司等軍政單位，還有遼東鎮、薊州鎮、昌平鎮、真保鎮所轄軍事防區的相關資訊。此外，書中還有戰車、冷兵器、火器、火藥、空心敵臺等示意圖，生動、形

① 彭勇《明代領班武官敕書“坐名”試析》，載於《明史研究論叢》第八輯《明代詔令文書研究專輯》，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② 永瑤、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五《史部十一·詔令奏議類·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17頁。

③ 《中國地理圖籍叢考》甲編《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二《邊鎮合志》，第39~41頁。

象而具體地展示了明代中期軍鎮的軍事裝備水準和防禦能力。

《四鎮三關誌》也是研究北方民族關係的重要史料。北邊之防在“北虜”，對蒙古部的資訊收集同樣重要，在卷十《夷部考·四鎮夷部總論》中作者有言“中國之必有夷狄，與夷狄之必不忘窺中國……今以北虜諸部落詳其世系，而屬夷附之，再紀其頻年入犯之自，俾司邊者為鏡觀焉”^①。該卷字數僅兩萬餘，篇幅不大，主要記載有四鎮三關的防禦對象、防禦形勢和歷年衝突的大事等。由於全書都是在講四鎮三關整體防禦體系的問題，所以，全書的內容無不是在圍繞民族關係展開，故此書的民族史料價值又絕不僅僅體現在卷十上。實際上，此書對整個明代北邊防禦戰畧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體現，即便是對許多細節的記述同樣值得人們關注。試舉二例。

其一，關於明代“忠順軍”或“忠順營”的記載。忠順營的前身是明朝建立後、由入仕中原的少數民族組成的“達官軍”，其民族成分包括蒙古、女真和回回等。嘉靖至隆慶年間，北邊防禦形勢發生新變化，在保定、大同、河間等達官軍相對集中的地區，達官軍遂改組為忠順營。忠順營將士在明代中後期的京畿地區征戰和戍守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明朝滅亡後，忠順營的建置被取消，被并入當地行政組織。然而，就是這樣一支在歷史舞臺上曾經扮演重要角色的少數民族武裝力量，被學術界長期忽視，其主要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在《明會典》和《明實錄》中，對忠順營僅有簡單的沿革交代。但《四鎮三關誌》中提供的詔敕奏議以及邊關防禦的糧餉、馬匹和官兵等配備記載，忠順營共計出現有四十三處，給我們提供了較為詳細的資料。其中兩份敕書《敕保定忠順營都司盧徹》、《敕定州忠順營都司楊國卿》更是珍貴，它們直接提供了忠順營官員的職掌情況，對我們瞭解忠順營建立的背景，忠順營的組織管理、職掌及其演變等基本史實，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②

其二，“夜不收”是活躍在明朝北邊防禦一綫的重要軍兵種，既擔任情報的刺探，也負責前沿陣地的防衛和各墩臺的駐守。^③然而，長期以來，學界僅知道這一軍兵種的存在，却對這項軍制的創制與發展詳情理不清楚。可喜的是，在《四鎮三關誌》的《軍旅考》、《經畧考》、《制疏考》之中，“夜不收”一詞出現高達八十四次之多，這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北邊防禦體制中“夜不收”的最詳細數量，還提供了這一群體的組織、建制、功能、生活、存在的問題及其對明王朝軍事、政治制度運行的影響等諸方面的史料，同樣是其他史籍所無法替代的。

此書價值之高，白壽彝先生總主編的《中國通史》一書評價說：“明代邊務志書有

① 本書卷十《夷部考·四鎮夷部總論》。

② 彭勇《論明代忠順營官軍的命運變遷》，載《中州學刊》2009年第6期。

③ 柏樺《明代的夜不收軍》，載《古代文明》2013年第1期。

數十種，以此志最詳。”^①

三、版本流傳

《四鎮三關誌》雖然於萬曆四年順利刊行，但似乎發行和流通並不是很順暢，不然，何以其版本、內容和卷次在明末就已經含混不清？就是明代最著名的目錄文獻學著作《千頃堂書目》也誤記為十二卷。到清代，它更是遭到禁燬。據《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一三四〇號檔案《浙江巡撫琅玕奏呈查繳禁書清單》（軍機處錄副奏摺）載，“乾隆五十四年十月，浙江巡撫臣覺羅琅玕跪奏，謹將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奏繳應禁各書名目繕具清單，恭呈御覽。計開……《四鎮三關誌》一本，明劉效祖撰……以上共書一百四十六種，共計一千五百三十五本，俱係軍機處暨四庫館行知全燬、抽燬並外省、浙省繳過各書”^②。抽燬的主要原因，《清代禁燬書目四種》稱是“其第十卷夷部語多誣謬，應請抽燬”^③，所謂的“誣謬”主要是因為此書大量記載遼東史實，直接涉及清入關之前女真人的歷史，其中的“華夷之辯”觀點更是與入主中原之後的清王朝“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意識形態相違背。

近幾年，此書流傳和使用最為廣泛的版本為《四庫禁燬書叢刊》本。該本署“明劉效祖撰，《中國文獻珍本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年刻本”。《中國文獻珍本叢書》係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印中心編印，《四鎮三關誌》在1991年影印綫裝發行。據該書的版權頁資訊和書前整理者吳豐培所撰《四鎮三關誌序》，僅談及“以明原版影印”，未談及底本的詳情。整理的技術處理方式，是“除加斷句外，凡版面不清處，均加修整，缺字可補者描補，無法讀識者概存原貌。缺頁因無他書可補，只得注明”^④。通過對比分析“禁燬本”鈐印和藏書章可知，它以浙江圖書館藏萬曆刻本和南京圖書館藏善本為底本合并而成，以刻本為主，也有數量不少的抄配內容。

該書版本、收藏和流傳情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記有兩個版本：一是署王之弼、劉效祖纂修，萬曆四年刻本（編號11146）；二是署名相同的清抄本（編號

① 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九卷《明時期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67頁。

②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62~2168頁。

③ 姚觀光輯《清代禁燬書目四種》，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第二集七百種，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二十六年，第34頁。

④ 吳豐培《古籍題記選錄（三）》，《吳豐培邊事題跋集》，第12頁，另載《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學刊》1994年第3期。

11147)。萬曆刻本，僅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藏各一部。^① 實際傳世的還不僅如此，當然，數量極其有限。孫迎春經過考訂認為，南京圖書館藏萬曆刻本，《明史·藝文志》及《千頃堂書目》均作十二卷，與此萬曆志卷數不合，估計實為一書。^② 陳光貽《稀見地方志提要》、《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等書作“明萬曆四年（1576）刻本”^③。但就南京圖書館所藏來看，該書半頁十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同，四周雙邊，版心下分別題以天干，有圖七十一幅，“然志中記事止萬曆六年，見卷八《職官考》第25頁，且字體、墨色顯有差異，故版本作明萬曆四年（1576）刻六年（1578）增修本。又卷一至七、卷十配抄”^④。實際也是抄配、增修本。

經查，萬曆四年原刊本《四鎮三關誌》還典藏於臺北故宫博物院，在臺灣亦屬於珍稀的孤本。現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有萬曆丙子年（四年）原刊本，其“古籍善本資料庫”列入“史部—地理類—邊防之屬”，登記資訊為“抄本”、綫裝四函、二十冊、附圖，係臺灣“國防部”1983年捐贈。有學者研究認為，臺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地方志，一是原清宮舊藏，二是日本侵占華北時期搶劫而來的，故以河北、山西、河南、陝西、山東、察哈爾、內蒙古、熱河等地方志為多^⑤，《四鎮三關誌》應屬於第二種情況。臺北故宫博物院另藏有一套北平圖書館移交的萬曆原刊本十冊，詳情不明。

到了晚清和民國時期，文網鬆弛，邊關時局緊張，邊關志書再度引起愛國學者的強烈關注。現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光緒十五年（1889）李文田抄本兩函十冊（存卷一至卷九），另有民國間抄本四函二十二冊，均署名劉應節修，仍為十卷本。鈐有“璜川吳氏收藏圖書”藏書印。璜川吳氏藏書始自吳銓。吳銓，字容齋，人稱容齋先生，休寧人，隨父遷居上海，老而復遷居長洲。雍正中為吉安知府，歸田後居瀆川遂初園，讀書其中，藏秘笈萬卷，多宋元善本。室名“璜川書屋”、“遂初園”。藏印有“璜川吳氏探梅山房印”、“璜川吳氏收藏圖書”。吳氏藏書歷經四代，至清後期散逸。^⑥ 另外，天津圖書館藏有萬曆《四鎮三關誌》十卷，署劉應節、楊兆修，劉效祖纂，二十冊，十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十九字，藍格白口，四周雙邊。據其描述，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吳氏收藏當為同一抄本。

①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卷十一《地理類二·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92頁。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藏書單位代號表、藏書單位檢索表，萬曆四年刻本藏書單位代碼為1601和1701，即為南京圖書館和浙江圖書館。

② 孫迎春《南圖館藏四種稀見明代方志考述》，載《圖書館雜誌》2004年第10期。

③ 陳光貽《稀見地方志提要》卷二《河北》，齊魯書社1987年，第126頁；中國科學院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河北省》，中華書局1985年，第28頁。

④ 孫迎春《南圖館藏四種稀見明代方志考述》，載《圖書館雜誌》2004年第10期。

⑤ 盧雪燕《臺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方志論述》，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5期。

⑥ 葉昌熾著、王欣夫補正、徐鵬輯《藏書紀事詩》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51頁；張翔《清乾嘉時期蘇州的徽籍藏書家》，載《圖書館雜誌》2000年第8期。

本次校注採用的對校本為國家圖書館藏民國間抄本《四鎮三關誌》，十卷，二十一冊，有圖。除紙質藏本外，目前可在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數字方志庫全文閱讀原書電子照片。其版式為：朱絲欄，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半葉十行，行十九字、二十字不等，小字雙行十九字。該抄本首頁為《纂修邊誌檄文》。卷一《分野星宿圖》鈐印“北京圖書館藏”。首頁、卷一《分野星宿圖》及以後各卷卷首鈐有“子樵珍藏”藏書印。從“子樵珍藏”藏書印可知，該書曾為方覺慧先生收藏。按方定一《方覺慧先生小傳——紀念先父逝世五十周年》（載《近代史學刊》，2012年00期），方覺慧，湖北蘄春人，1886年（光緒十二年）生於南京穆陵關，卒於1958年。原名方士楷，后改名方學慧，民國元年改名方覺慧，號子樵。少年時畢業於黃州府中學，二次革命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據倫明著、雷夢水校補《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15~116頁），方覺慧先生精心明史研究，擬改造《明史》，所收明代史料盈數屋。其著有《明太祖革命武功記》、《老子道德經註解》、《孔子編年考》等。

2011年6月3日，在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的春季拍賣會中的“古籍文獻及名家墨迹”專場上，一套《四鎮三關誌》拍出356500元人民幣的高昂價格。據商品描述，該書係明萬曆四年（1576）刻本，一函五冊，白棉紙本，31.1cm×19.3cm，“初裝五厚冊，白棉紙初刊精印，品相保存完好，足為藏家所寶。此書甚少，民間尚無現世”^①。可見，受清廷的禁燬，《四鎮三關誌》的流傳受到極大影響。雖有傳世，但數量極少。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部古籍的珍貴之處。

① 保利拍賣本介紹，<http://www.polypm.com.cn/index.php?s=Auction/view/ppcd/art5002791966#>，“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官網”，2016年4月28日訪問。

校注說明

1. 本書校注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一〇冊所收《四鎮三關誌》（據《中國文獻珍本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年刻本，北京出版社1997年）為底本（此版本為萬曆四年刻、六年增補本，以及少量的抄本配補，本書校注時稱其為“底本”），並參照以下版本：

（1）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民國間抄本，十卷，簡稱民國間抄本，此為本書主要的對校本。凡本書出現“據民國間抄本補”者，均係該版本。

（2）南京圖書館藏萬曆刻本，十卷，有影印本收入《南京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3~5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簡稱南圖本。

（3）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李文田抄本，存卷一至卷九，有影印本收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9~11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簡稱北大清抄本。

2. 本書校注嚴格遵循底本，底本缺漏、不清之處，主要依據民國間抄本補出，間有參考其他史籍補出者。鑒於民國間抄本晚出，且流傳不廣，其中抄錯者頗多，故出校僅針對與底本相異且無法判斷之處，或兩說可並存者，其餘訛誤錯漏均不一一出注。

3. 校記。

（1）為方便讀者對照閱讀，校與注的內容均以腳注形式出現、連續編號，校的內容係原書有誤或存疑者，以“[校]……”形式行文，如：[校]通，底本不清，據民國間抄本補。

（2）注釋條目，以首次出現標注，後文重複出現，除有必要者，一般不再標注。

（3）注釋中所徵引文獻，僅在首次出現時標明版本。

（4）對較難理解的字詞、典故，加以解釋，並舉出史籍中使用該字詞、典故的例子。如：“借箸而籌”，指從旁為人出主意。語見《史記》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2040頁，張良語：“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裴駰集解引張晏語：“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4. 繁體字的使用。對於校注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用詞不統一及異體、繁簡混用和俗字字體，如底本中“佛郎機”與“佛朗機”混用、“蓋州”與“盖州”混用，本書儘